

国际关系史研究

伊朗伊拉克关系研究(1979—1991)

范鸿达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过去40余年中,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伊朗1979年革命以后,由于教派分歧、地区领导权争夺、领土纠纷等因素,两伊冲突呈加剧趋势,并且最终导致爆发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使两伊关系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长。随着冷战结束和地区形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处境越发困难,国内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在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磨难后,两国关系渐趋解冻并获得一些发展,但前景仍不容乐观。

关键词: 伊朗;伊拉克;中东;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3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05)01-0028-06

伊朗和伊拉克两国是海湾(即波斯湾)地区多有冲突的近邻。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围绕这两个国家先后发生了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于这一时期的两伊关系,各国专家学者已有一些研究¹,但将这10余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拟就此做些探讨。

一、两伊冲突的根源

(一) 宗教教派冲突

伊朗和伊拉克虽然都是伊斯兰国家,却有着不同的教派信仰。由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世时没有指定接班人,因此在他死后,围绕权力继承问题,穆斯林内部发

生了分歧。一部分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拥有继承权,他们被称为阿里党人,以后发展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在阿语中,“什叶”意即“党人”、“派别”)。在后来的长期的教派分歧中,什叶派对伊斯兰教的教义也逐渐有了独特的理解。但是什叶派只是穆斯林中的少数,当时大部分穆斯林是遵守“逊奈”(圣训)的人,这些人逐渐发展形成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别逊尼派。在绝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里,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处境相差很大:逊尼派往往是统治者,是社会主流,而什叶派常以反对派面目存在。为了改善生存环境,争夺国家权力,推广自己的教义,什叶派经常以起义的方式对抗逊尼派掌握的国家政权。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

收稿日期:2003-10-25

作者简介:范鸿达(1974-),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

¹ 例如 J. M. 阿卜杜哈尼:《伊朗和伊拉克:危机年代》(J. M. Abdulghani, *Iran and Iraq: Years of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巴特图:《伊拉克秘密什叶派运动的原因和前景》(Batatu, 'Iraq's Underground Shira Movement: Cause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1981); R. K. 拉马扎尼:《革命的伊朗:中东的挑战和回应》(R. K. Ramazani, *Revolutionary Ira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卡斯主编:《伊朗-伊拉克战争:冲突与影响》(Karsh(ed.) *The Iran Iraq War: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沙拉姆·库宾、查利斯·特利普:《伊朗和伊拉克战争》(Shahram Chubin and Charles Tripp, *Iran and Iraq at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安德鲁·T. 帕拉斯利提:《伊朗和伊拉克:变更的关系与前景》(Andrew T. Parasiliti, 'Iran and Iraq: Changing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ed.), *Iran and Arab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等。

开始在伊朗广泛传播。作为被征服、被统治者,波斯人更倾向于接受什叶派伊斯兰教,这其中有感情和心理因素,也有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不被阿拉伯主流社会同化的因素。波斯人经常在宗教教派矛盾的掩护下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1502年伊朗萨非王朝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什叶派力量获得更大发展,什叶派伊斯兰教逐渐成为波斯文化和伊朗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此后伊朗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因为教派不同而更加恶化。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之间的关系受教派冲突的影响更大,因为两国当权者分属不同教派,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91%,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虽然占其总人口的55%,但是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却是占人口总数44%的逊尼派穆斯林[1](p. 275, p. 280)。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教派冲突对两国关系的严重影响愈加明显。伊朗大肆鼓吹要以什叶派共和国取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政的伊拉克政权,企图在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建立神权国家,为此给予伊拉克什叶派反对力量大力支持。伊朗的努力在1979年6月见到了成效:由于伊拉克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巴克尔·萨德尔企图领导一次庆祝伊朗革命成功的游行,导致纳贾夫和卡尔巴拉两圣地发生严重骚乱。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对这次游行的强力镇压激怒了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此后双方的语言攻击日益尖锐,霍梅尼在萨德尔被处决后公然号召伊拉克民众“像伊朗那样”推翻萨达姆政权,企图从内部瓦解伊拉克,这使两伊关系更加恶化。

(二)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冲突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霍梅尼推崇的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是造成两伊关系紧张的又一重要因素。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2](p. 318),甚至有学者认为其根源可上溯到1400年前[3],但是一般研究者都把1904年纳吉布·阿祖利发表《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看作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4](p. 43)。其后这种社会思潮进入了缓慢发展期,直到50年代纳赛尔在埃及上台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才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主张在“民族”的旗帜下实现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不仅统一现有的阿拉伯各国,还要解放他们认为应该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包括对伊朗利益攸关的伊朗胡其斯坦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试图使海湾阿拉伯化,将“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即是例证。伊朗绝大部分石油产自胡其斯坦省,波斯湾则是伊朗通向海外的最重要的水上通道,若其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伊朗必将受制于人。显然,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对伊朗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是伊朗所不能允许的。

纳赛尔去世之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担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纳赛尔和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间地方性和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变,或者说被等同于强调阿拉伯政治统一和摆脱外国控制、赢得独立的一种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5](p. 92)正如当时的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所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它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持久存在,是强有力的纽带,使个人依附于其民族;而复兴社会党号召的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正是阿拉伯人民自由、统一意志的表达[6](p. 29)。1979年萨达姆出任伊拉克总统后,俨然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居,他发出豪言:“阿拉伯人的荣耀来自伊拉克;在整个历史上,当伊拉克繁荣强大时,阿拉伯民族也繁荣强大。这就是我们要尽力使伊拉克强大、难以对付、有能力且发达的原因,也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增强伊拉克的安全、光大伊拉克的荣耀的原因。”[7](p. 194)由于萨达姆有这样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还因为他有称霸海湾的野心,所以在阿拉伯世界面临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时,他才会与之针锋相对,站在了与伊朗对抗的最前沿。

泛伊斯兰主义是在19世纪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奥斯曼帝国腐朽统治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认为穆斯林的团结是保障自己权利的最好武器。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泛伊斯兰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主张,全世界穆斯林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的统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在他看来,穆斯林民族联合的范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2](pp. 287~317)。显然,在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二者间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以宗教为纽带,后者以民族为中枢;前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教的穆斯林,而无论其是否同族,后者却对同教不同族的穆斯林具有强烈的排斥性。作为中东第一大民族的阿拉伯人既是前者最重要的争取对象,又是后者的全部。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都必定会给对方造成极大削弱和威胁,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霍梅尼在伊朗上台,二者的竞争与冲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霍梅尼是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宣称的伊斯兰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否定民族主义,不管是伊朗民族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都被他视为从西方传来的毒素,有害于伊斯兰社会的统一。霍梅尼说:“在讲不同语言——例如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穆斯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此类问题极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国家统一的人编造的……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但这与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他们的意图是要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8](pp. 216~217)霍梅尼对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大加鞭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还包括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统治;反对君主制;强烈地反帝、反西方化和世俗化;通过向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等等[9](pp. 270~274)。在霍梅尼看来,大多数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而且弊端丛生:“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6](p. 24)基于这样的认识,霍梅尼认为加强各地穆斯林的团结、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穆斯林最好的选择,这样的政府是教法学家领导的、政教合一的、宪政的民主政府,是取代阿拉伯各腐朽政权的最佳模式[10](pp. 129~130)。

为了达到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目的,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高举输出革命的大旗,宣称什叶派伊斯兰教革命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号召各地穆斯林反抗现政府,建立和伊朗一样的伊斯兰政府。这种输出革命的做法造成了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各国的惴惴不安,各个弱小的海湾君主国纷纷寻求外力来保全自己,于是一心想当阿拉伯世界领袖、同时也深受伊朗输出革命威胁的萨达姆自然就成了中东地区各君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面对霍梅尼的咄咄逼人之势,萨达姆进行了坚决回击。不同于霍梅尼的“政治、宗教一体论”,萨达姆口头上反对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以防止宗派主义蔓延;他还以强调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特性的方式来弱化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挑战:“我们正看到的事态发展不能让我们相信,伊朗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伊斯兰教意义上的伊斯兰革命……《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真主赋予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担当领导角色。”[6](p. 220)霍梅尼所宣扬的泛伊斯兰主义和萨达姆所推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把两伊关系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三) 争夺霸权和领土纠纷

作为海湾地区人口最多、国土最大的国家,伊朗长期以来一直有称霸海湾的梦想。早在巴列维国王当政时期,伊朗拥有的海军、空军力量就已经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海

空军力量的总和不相上下,自称是世界第九富裕国家[11]。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促使巴列维国王的霸权欲望膨胀,正如他自己所言,伊朗要恢复领导海湾地区的“历史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也力图扮演全世界穆斯林领袖的角色,大力倡导输出革命,并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他们的反政府行动,这实际上是伊朗争取地区霸权的另一表现形式。而且,革命后伊朗非但没从有争议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撤出,反而还重新向巴林提出了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要求¹。伊朗的地区称霸之心昭然若揭。

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伊拉克国家政权,该党的宗旨是在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自由、社会主义”。70年代的石油经济带来了巨额收入,特别是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上台后,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的主要追求,加之埃及在1979年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而被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姆认为自己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但是在海湾地区,萨达姆却遇到了来自伊朗的有力挑战。这样,在同一地区,一个要当霸主,一个要做领袖,对权力不可遏制的欲望和追求把两国推向了直接对抗的境地。

领土纠纷是两伊由对抗走向战争的导火索。长期以来两国之间存在着阿拉伯河争端问题:伊拉克要独占全河,伊朗则要求占有河的一半。在不同时期,这一争端一般是以有利于国力优势一方的方式解决。而随着相对国力的不断变化,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不断冲突也就在所难免。1980年9月17日,对本国实力信心十足的萨达姆单方面废除了1975年与伊朗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④,宣称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拥有完全主权。这自然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对。于是萨达姆在维护阿拉伯主权的名义下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

二、两伊战争及战后两国关系

(一) 两伊战争

萨达姆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是因为伊朗刚刚经历了伊斯兰革命,旧体制已被打破,新体制尚未建立,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萨达姆认为,各派力量争斗不息的伊朗已经不再是伊拉克的对手。但萨达姆显然低估了伊朗的实力。在经过战争初期的挫折之后,伊朗迅速组

¹ 1971年英国撤离波斯湾后,伊朗在当年11月30日派兵抢占了巴林群岛的这三个岛屿。这三个岛屿扼守波斯湾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至今这个问题仍然制约着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海湾地区各君主国的关系发展。巴林群岛曾被伊朗控制达数百年之久,巴列维国王当初为了减轻因占领上述三岛而招致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扩张的恐惧,曾宣布放弃对巴林的主权要求,但是却遭到伊朗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革命后伊朗旧事重提,再次申明对巴林群岛主权的要求。

^④ 协议规定两国河界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但是伊朗应在其西北地区划出一块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伊拉克的补偿,并停止对伊拉克反政府力量库尔德人的支持。伊拉克把此协议看作是敌强我弱时的权宜之计,而事实上伊朗也没有给伊拉克那块补偿性质的土地。

织起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快便扭转了战局,1982年6月伊拉克军队被赶出伊朗国土。此时伊朗获得了绝佳的停战机会,况且萨达姆也在呼吁谈判,但霍梅尼领导的伊朗却选择了继续战斗。战争使原先激烈斗争的国内各派力量趋向团结,使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获得巩固,霍梅尼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担心战争一旦停止,这一切都会失去;更重要的是,他还担心失去传播泛伊斯兰主义的有利机会。因此,不管是为进一步巩固伊朗新政权,还是为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都需要继续进行战争,何况当时伊朗正拥有暂时的战略优势。

但是当战场转移到伊拉克境内之后,伊朗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境地:陌生的地理环境,匮乏的武器装备,孤立的国际地位——这些不利因素使伊朗曾拥有的相对优势骤然失去。而这时伊拉克却以被侵略国的姿态出现,得到了与伊朗交恶的海湾各君主国、埃及以及美、苏、法等国的巨大财政援助和武器供应。在战场上毫无收获的霍梅尼只好在1988年7月20日宣布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协议。

然而在伊朗宣布接受停火协议后,伊拉克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越过边境线,变本加厉地抢占伊朗领土,俘虏伊朗士兵,企图在战后谈判中抢得先机。这激起了伊朗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给入侵的伊拉克军队以有力打击,国际舆论也向不利于伊拉克的方向发展。在各方面压力下,伊拉克不得不于8月6日宣布停火,两伊最终停战。

两伊战争长达8年,而当停战之时,两伊均未能实现自己初始的战争目标:伊拉克没能称霸海湾,也没能独占阿拉伯河;伊朗也未能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未能把萨达姆赶下台。不过,两国也各有所获:在战争过程中,伊拉克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伊朗则巩固了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战争还使伊朗认识到,武力并非输出革命的最佳途径。伊拉克也意识到,要取得地区霸权必须另辟新途。基于这样的认识,战后两伊间的直接对抗减少了,双方关系渐趋解冻。

(二) 两伊和谈

从停火到1990年春,两伊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了数轮谈判。在谈判中双方关注的首要问题各不相同:伊拉克认为它赢得了战争,所以有理由从战争中获利,它要求独占阿拉伯河,这是它在谈判中关注的首要问题;伊朗则把伊拉克从伊朗完全撤军视作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双方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谈判注定不会进展顺利。除此之外,伊拉克的蓄意拖延也是这一阶段两国谈判没有进展的重要原因。一位伊朗外交官曾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伊拉

克并不想解决与我们的争端。为什么?因为8年的战争给萨达姆留下200万名伤员,60万具尸体,1500亿美元的财政损失和10座被摧毁的城市。如果萨达姆为交换战俘而撤出所占伊朗的国土,伊拉克人民就会质问萨达姆:8年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如此重大损失的回报是什么?你又究竟赢得了什么?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萨达姆并不想解决这场危机。”[12](p.33)

但是随着科威特危机的爆发,萨达姆为入侵科威特而将其军事主力转移到了伊(拉克)科边境地区,这样他就必须在两伊和谈中取得进展,以便尽早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避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于是两伊关系有了改善的契机。

1990年4月至8月,萨达姆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之间的信件往来十分频繁,这大大推进了双方的和谈进程。萨达姆在4月21日的信中,提议两国领导人在沙特国王的调解下直接会谈,还提及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伊朗方面迅速对此做出回应,拉夫桑贾尼在回信中虽然仍然谴责萨达姆发动了战争,但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则肯定萨达姆的信件含有良好意图;副外长贝沙拉提也说伊朗将支持“任何受到以色列攻击的阿拉伯国家”,这当然包括伊拉克在内。

5月19日萨达姆又向拉夫桑贾尼发出一信,并于6月18日得到回复。这一轮“信中谈判”显然取得了很大进展:当伊朗发生大地震¹后,伊拉克于6月24日向对方提供了24吨救援物资[13](pp.12~13),伊朗则对此善举广泛宣传。7月3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两伊外长实现了自停火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是两伊关系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虽然两伊之间已有改善关系的迹象,但8月2日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还是震惊了伊朗。拉夫桑贾尼总统不安地说:“无疑,当两个国家正举行和平谈判之时,在没有一点通报或协商的情况下就对一个邻国发动了一次无法想像的袭击……这将减少我们的信任……特别是由于自这一阶段(和谈)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显示良好意愿的举措。”[14](p.49)

为了安抚伊朗,萨达姆在入侵科威特后向拉夫桑贾尼做出了更大妥协。在8月14日致对方的信中,萨达姆终于答应了伊朗的条件:承认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议,放弃独占阿拉伯河的要求,而且决定从8月17日起开始从伊朗撤军。萨达姆在信中悻悻地说:“一切都已明了,你们全力想要的一切都已经得到了”;“或许将来我们还会在这个

¹ 1990年6月21日,伊朗西北地区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约5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50万人无家可归。

世界中合作,以使海湾成为和平与安全的地方,没有外国战舰和军队敢于试图袭击我们。”[14](pp.49~50)

这样,在最为关键的阿拉伯河归属及撤军问题上,由于伊拉克的让步而使两伊达成了和解。伊朗外长韦拉亚提把这一成果视作自伊朗革命以来该国最伟大的胜利。的确,为了全力应付由入侵科威特而引发的海湾危机,急切地想从伊朗脱身的萨达姆做出了重大让步。

(三) 海湾战争中的两伊关系

经过8年残酷战争及战后艰难的和平谈判,伊拉克意识到伊朗是难以攻克的。在这种情况下,为开辟通往海湾的通道,攫取战后重建所急需的财富,谋求地区霸权,伊拉克把目光投向了近邻科威特,企图通过吞并这个弱小而富裕的国家来获取海湾地区优势。伊拉克的这一不轨之举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数十国部队在海湾地区迅速集结,海湾局势骤然紧张。

海湾危机和随后的海湾战争使伊朗陷入矛盾境地。一方面,伊朗此时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任务,而重建有赖于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在霍梅尼死后掌权的伊朗务实派正为此而努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这迫使伊朗必须要在谴责伊拉克侵略行为方面与西方保持一致,对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针对伊拉克的决议表示支持。事实上,在侵略发生的当天,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就谴责了伊拉克:“(伊朗)反对任何形式的以诉诸武力解决地区问题。伊朗认为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是与波斯湾的稳定和安全相悖的,应受到谴责……伊朗呼吁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回国际公认的边界,并寻求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案。”[15](pp.47~48)另一方面,海湾危机和随后的战争也使得伊朗在与伊拉克打交道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为了全力对付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萨达姆同意按照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解决两伊边界问题;同意接纳更多的伊朗穆斯林进行宗教朝觐;虽然伊朗行动相对缓慢,但是伊拉克在1990年9月份就基本释放了全部伊朗战俘,而且还把位于伊拉克境内的一个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组织驱逐出境[16](p.14)。由于伊拉克的一系列让步,两伊于1990年10月重建了1987年中断的外交关系。

这样,伊朗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便对伊拉克采取了两面政策:在与伊拉克实际上改善关系的同时,又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继续谴责伊拉克。国防的、安全的、经济的及商业的各种因素使得海湾对伊朗的生存发展利害攸关,维护海湾的安全与自由开放是伊朗外交的头等大事。伊朗人深知,若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的阴谋得逞,肯定会激发萨达姆更大的野心,伊朗在海湾也必将受制于伊拉克。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湾的集结以及伊拉克的前途也让伊朗忧虑重重。伊朗担心美国军事力量会在本

地区长期存在下去,这势必损害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地位与利益。伊朗还担心伊拉克被肢解,从而产生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这将会使伊朗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左右为难的伊朗政府在海湾危机及其后的海湾战争中执行了严格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受到了反美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大力挑战,伊朗的务实派领导人却始终坚持。

结语

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特别是在霍梅尼时期,输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外交的一个重要考虑。革命后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像其他新生政权一样感到不安全,认为要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输出革命,使其他伊斯兰国家与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而且当时的伊朗革命领导人认为在伊朗周围地区建立这种伊斯兰秩序是可行的[17](p.52)。伊朗的这个外交指导思想严重挑战了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权威性,是这些政权,尤其是自视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萨达姆所不能接受的。在两伊停火后,虽然伊斯兰革命遗风仍然左右着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基于民族利益,伊朗政权努力使自己的外交政策温和化,这就给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在内缓和关系提供了政策保证。

这一时期伊拉克的外交特点是明显的霸权主义,萨达姆在10年当中两次把国家带入战争境地就很能说明问题。伊拉克国力有限,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争取到地区超强地位,所以必须依靠海湾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伊朗大肆输出革命正好给伊拉克提供了一个显示领袖地位的绝佳机会。不过伊拉克并没有绝对的实力来控制海湾各阿拉伯国家,它只能在各方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充当领袖,一旦各方利益出现分歧,伊拉克就无法取得海湾各国的支持,从而也就无力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海湾战争的迅速结束对伊朗而言是一大解脱,但对两伊关系来说却并非继续改善的起点。战后伊朗虽然取代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因为沙特、埃及等国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提升,尤为重要是战后美国力量进驻海湾,这些变化限制了伊朗在海湾的行动自由,使得它要想在海湾发挥作用,只能通过某种地区安全框架,而若没有美国的同意与支持,伊朗显然无法在任何地区安全框架中取得与它实力相称的地位。这样,为了争取有利的地区地位及战后重建的资金与技术,伊朗不得不转向西方;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转向西方就意味着必须疏远西方的死敌萨达姆。基于这些考虑,战后伊朗拉大了与伊拉克的距离,拉夫桑贾尼总统甚至公开呼吁萨达姆“顺应人民的意志”自动下台。伊朗的这些举动给此后的两伊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参考文献:

- [1] 王京烈主编.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3] 张国伟.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J]. 阿拉伯世界, 1990, (3).
- [4] 杨灏城, 朱克柔.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5] [美] 埃斯波西托著, 东方晓等译.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6]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M].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3.
- [7] A. Baran .“Awmiyya and Wataniyya in Ba’ athi Iraq: The Search For a New Balance”[J]. *Middle East Studies* , 19, April 1983.
- [8] Milton J. Esman, Itamar Rabinovich. *Ethnicity, Plur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9] 刘竞, 安维华. 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10] 刘靖华, 东方晓. 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1] 钱乘旦. 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J]. 世界历史, 1998, (3).
- [12]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 (DR): North Africa and Middle East (NES), 14 March 1990.
- [13] FBIS, DR: NES, 5 July 1990.
- [14] FBIS, DR: NES, 1 November 1990.
- [15] FBIS, DR: NES, 3 August 1990.
- [16]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9 November 1990.
- [17] [伊朗] 马哈茂德·萨瑞奥嘎哈拉姆著. 曲红摘译. 伊朗、中东和后冷战时代[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8, (4).

(责任编辑: 梁二南)

Iran Iraq Relations, 1979- 1991

Fair Hong da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Both Iran and Iraq are important count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ir relation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region. In the past decades, there were numerous problems that plagued the Irarr Iraq relations.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e Irarr Iraq War, and the Gulf War were important events that shaped their relations. To this day, though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Iraq have improved, their relations are still far from optimism.

Keywords: Iran; Iraq; Middle East; Ideologic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